

20^{世纪} 中国古典文学 学科通志

第3卷

编写指导 徐公持
主 编 刘敬圻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04AZW003)

20世纪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3卷

顾问 傅璇琮 徐公持
特聘编写指导 徐公持
主编 刘敬圻
副主编 张安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 3 卷 / 刘敬圻主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328-6301-3

I. ①2…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概况—20 世纪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3509 号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三卷

主编 刘敬圻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 真: (0531)82092663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23.875 印张

字 数: 5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301-3

定 价: 67.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888

目
录

抗日战争中的古典文学研究·····	001
《国文月刊》与古典文学研究·····	034
解放区文艺政策与古典文学研究·····	059
三四十年代古典小说研究的进展	
——以孙楷第与中国古典小说文献学之创立为中心·····	076
三四十年代古代戏曲研究的进展·····	108
三四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的进展·····	153
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古籍整理·····	183
1949年前敦煌文学研究的新开拓·····	205
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古典文学学科·····	263
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古典文学学科·····	297
人民性、阶级分析与古典文学研究·····	337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与古典文学研究·····	371
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与古典文学研究·····	407

1954 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	458
世界文化名人与古典文学研究	
——屈原、杜甫、关汉卿、孔子与张衡	492
《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及其影响	540
50 年代后期关于文学史规律问题的讨论	
——特定政治文化大背景下学科性格表现之一	574
对《琵琶记》、曹操讨论的反思	
——特定政治文化大背景下学科性格表现之二	608
对“中间作品”及相关作家作品的讨论和阐释	
——特定政治文化大背景下学科性格表现之三	644
“大跃进”与古典文学研究	671
60 年代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本、游国恩等主编本	696
参考文献	728

抗日战争中的古典文学研究

—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空前震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生维艰,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摧残。日本侵略军大肆破坏、摧残中国教育文化机构,高校惨遭轰炸、劫掠。此前,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期,日军已轰炸、破坏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造成损失763159元。^①全面抗战之前,中国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其中上海、北平,加上河北(包括天津)、广东,占总数的一半。这些地区都是罹战地区,其高校、研究机构遭到极大的破坏。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飞机将南开大学夷为废墟,学校的图书馆、学生宿舍、教学楼完全被炸毁。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成为轰炸重点,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广东的中山大学等23所学校遭受破坏。日军占据的城市,大学往往成为其驻军行营、伤兵医院等。据统计,全面抗战开始后,全国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完全遭破坏,25所陷于停顿。^②

^① 强重华:《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第34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② 苏智良、毛剑锋等:《去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第1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为了避免更大的破坏,主要高校或合并,或迁徙,或撤设,颠沛流离,动荡不安。从1937年到1944年,中国高等院校进行了有史以来的大迁徙。内迁主要迁往战争波及较少的西南、西北等地区,总计迁移高校106所,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①当时设有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比较集中的高等学校,大多经受了迁徙、合并或联办。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临时大学,南迁长沙,1938年再迁昆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9月与北洋工学院等迁到西安,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又翻越秦岭,迁达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设在城固。1940年,从中独立出来的西北师院迁往兰州,整个搬迁过程长达四年。浙江大学先后五次迁徙,最后定址贵州。中山大学先定迁广西龙州,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澄江。一部分师生经广州、澳门、汕头等地,走香港经海防及河内入滇;另一部分师生经由其他道路,约于1939年3月下旬到澄江。还有少数学生,辗转沿连江西行,步行赴滇。东北大学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走上流亡之路,先后辗转北平、开封、西安,最后落脚四川三台。^②其他如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等迁往四川,国立师范学院收容沦陷区疏散至内地的名流学者定址于湖南蓝田李园,北平民国大学迁溆浦大潭。

高校西迁,知识分子随之。据当时学者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迁入西部。^③从

^① 苏智良、毛剑锋等:《去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第1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第148~16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

^③ 孙文本:《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二),第261页,重庆: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原话为:“大概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

事古典文学研究之学者也不例外。胡小石、罗根泽、朱东润、卢前、冒辟疆、吴梅、汪东、陈匪石、乔大壮、李长之、刘永济、罗常培、罗庸、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刘文典、吴晓铃、王力、马一浮、吴宓、游国恩、陈寅恪、陈梦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潘重规、沈兼士、姜亮夫、高亨、吴世昌、吴其昌、缪钺、王起、夏承焘、詹安泰、唐圭璋、饶宗颐、骆鸿凯、杨树达、马宗霍、钱基博、钱锺书、翦伯赞、顾颉刚、张舜徽、曾运乾、李肖聃、陈鼎中等，皆随之颠沛流离。

迁徙之路遥远、偏僻，过程非常艰苦，南下、西迁的研究人员大多身有亲历。其中，闻一多步行入滇最为特例。他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路遇沅陵的暴风雨雪，经过湘西土匪地段，步行 3600 里，费时 68 天，才达云南。^① 另一学者朱东润，任教武汉大学，抗战开始，武大教学逐步停止，回泰兴家居。1938 年 11 月接武大电报，告知学校已迁至四川乐山复课，希望次年 1 月 15 日前报到，于是抛妻别子，取道上海过香港，绕越南，经昆明、贵阳，到达重庆，13 日乘民航飞机抵乐山，前后行程万里，备尝艰辛。^② 时局动荡，社会不安，路途辗转非常危险。据卢前《上吉山典乐记》，1942 年冬天，卢前（冀野）前往福建永安就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途经金鸡岭，当地土匪误以为为国民党大员陈肇英，被劫持到寨子里，幸而最终机智脱险。

高校及学者西迁，促使古典文学研究地域分布格局稍显均衡。战前，古典文学研究机构、人才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武汉、杭州、广州等城市，这些城市研究群落占去当时全国古

①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 329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② 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四），第 222～233 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年。

二

典文学研究力量之大半还多。西部、中部不发达地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江西、陕西、甘肃等省大学既少,研究力量非常之薄弱。战争期间,大批高校内迁,上述研究者从战前的研究中心地区涌入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的西部,以及中部僻远地区如湖南蓝田等。以云南为例,抗战前,全省几乎没有什么高水准学校,古典文学研究力量相当薄弱,西南联大、中山大学等学校的迁入,以及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詹安泰、余冠英、游国恩等学者的到来,使其变成一个新的学术中心区。这样的变化,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上述古典文学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地区的研究发展,使研究格局趋于平衡。抗战胜利后,一些学者选择留在当地,如姜亮夫,1948年任云南大学文学院主任,后转到昆明师院,直到1953年才调离;罗庸,留任昆明师院国文系,后转到重庆;刘文典,一直任教于云南大学;徐中舒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到四川,后一直留任四川大学。联大培养的学生任教西南者有冯辉珍(云南师范大学)、常竑恩(云南民族学院)、郑临川(四川师范学院)、刘又辛(西南师范大学)、王彦铭(云南师范大学)、彭允中(云南师范大学)等,使当地的研究力量得到很大的提升,对古典文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生艰难,无论是现实的生存危机还是出于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怀,都远远优先于古典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整个中国知识文化界积极号召全民抗日,救亡护国。鲁迅在1935年就明确地提出:“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①1937

^① 鲁迅:《答徐懋庸并就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海:《作家》,第1卷第5号,1936年8月。

年,郑振铎要求文艺界“发动抗战的意志,整齐抗战的步骤,激起抗战的情绪,在前后方发挥着有益于抗战的宣传作用”^①。1938年,郭沫若更提出:“一切文化活动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上,集中在于抗战有益这一点。”^②抗日救亡思想是全国富有统治力的绝对主流思想,即使是与现实社会关系稍远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受到深刻的影响。

一、古典文学学科规模有所萎缩

20 世纪初期的思想文化活动中,古典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即将新的“科学方法”引入古典文学研究中来,嗣后之“整理国故”运动,也在古典文学领域掀起不小波澜。此后,以近代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蔚然成风,而传统的“义理、文章、考据”之学,也还在部分老一辈学者之坚持不懈中得以继续。抗战爆发后,事关民族存亡的严酷的现实斗争,吸引了全国民众包括文化人士的全部注意力和精神投入,远离现实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吸引力及社会文化地位当然都要退居在后。战前,中国文化的重心主要在上海、北平两地,战争初期,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文化中心发生大转移,中国西部的成都、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成为当时重要文化集中城市,此外也有部分文化人士暂时留居于未被日寇占领的上海(被称为“孤岛”的英、法租界),还有一小部分人因各种原因滞留于沦陷区。发起于上海的“国防文学”与以桂林为中心的“桂林文化城”等成为当时的文化焦点,聚集了大量知识精英。上述文化中心城市进行的文化运动,古典文学研

① 郑振铎:《抗战时的文艺政策》,上海:《战时联合旬刊》,第3期,1937年9月27日。

② 郭沫若:《抗战与文化》,武汉:《自由中国》,第3期,1938年6月20日。

究力量非常薄弱,现代白话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远远超过古典文学研究所引起的关注,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杂文、新编戏剧、通俗小说等成为文化界更多采用的形式、手段或体裁。这些体裁的创作呈现火热、繁荣的态势,其目的是宣传抗战,鼓舞抗战。对此,抗战之初即致力于抗战通俗文艺创作的老舍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谈到: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

此期的新编戏剧在内容上多选择古代题材,如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南冠草》,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以及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的作品,目的是古为今用,服务抗战救亡。田汉在《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中指出,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

大批知识分子放下从事的学业与研究项目,投身抗日,尤以青年学生为盛。据王学珍主编的《北京高等学校英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抗战期间,北京市各高校牺牲于抗战期间的毕业生90人左右。学术研究之风十分浓厚的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参军抗日者多达830多人,其间,中文系则一共只毕业了9名研究生。

一些研究者暂时中断古典文学研究,投笔从戎。如阿英,抗战前著有《晚清小说史》,抗战爆发,全力投入抗战,主持多种报纸、杂志,宣传抗日精神,创作历史剧《碧血花》(1939)、《海国英雄》(1940)、《杨娥传》(1941)、《洪宣娇》(1941),至1941年,携全家投身苏北抗日根据地。再如孙作云,“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罢课示威,甚至抬棺游行,到街头宣传、募捐,向南京国民政府请

愿。“一·二八”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学生组织义勇军,孙作云中断学业,加入 19 路军,为政府军 138 旅组织民众,为前线作战将士运送弹药给养,直到战局恶化,“学生军”解散为止。又如文学史家、词学家胡云翼,抗战前积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丰硕,计有《中国文学概论》(1925)、《词人辛弃疾》(1925)、《宋词研究》(1926)、《李清照评传》(1926)、《唐代的战争文学》(1927)、《宋诗研究》(1930)、《中国文学史》(1931)、《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中国词史大纲》(1933)、《中国词史略》(1933)、《词学概论》(1934)、《词学 ABC》(1934)、《中国文史大纲》(1934)、《唐诗研究》(1934)等。抗战爆发,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西战地政工总队任副总队长,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创办《浙西时报》和《浙西导报》,宣传抗日,培训骨干,扩大抗日队伍。后任敌后绍兴县长,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武装反扫荡战,其间曾身负重伤。直到抗战结束,胡云翼才重新回到古典文学研究的阵营。还有将主要精力用之于抗战宣传、组织工作者,如郭沫若等。

要之,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古典文学研究的规模,明显缩小,无论在人员和产生成果数量上,都呈下降之势。

二、古典文学研究的外在条件艰难

战争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外在条件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其一,日军殖民统治严厉钳制,专业人员遭受政治骚扰、迫害。日军在所占地区实施残酷的文化控制与高压干涉政策,加大文化产品的“检查”力度,逮捕、殴打、引诱、骚扰知名学者,制造出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后来回忆日军统治下的情形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①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的刘文

^①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重印后记》,见《陈垣史学论著选》,第 54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人劝请其出来做事，遭其断然拒绝。他会讲日语，从不在日本人面前讲，所谓“以发夷声为耻”。日人多次搜查其住宅，不断骚扰，刘文典忍无可忍，于1938年3月逃离北平，奔向西南联大。同样，吴承仕拒绝了日人让其任职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要求，遭到迫害，从中国大学辗转到天津，避住英国租界，日军派中国警察入内搜查。其中一次，吴承仕正在撰写文章，警察搜查，来不及藏匿，只好将文稿塞到小女儿的洋娃娃玩具腹内。留在北平的沈兼士，受到日伪主持文教的周养庵劝诱，要其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工作，被其拒之门外。他与辅仁大学同人秘密组织“炎社”（后改为“华北文教协会”），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口号，号召沦陷区文教界人士参加抗战活动，深为敌伪所忌。日军除派特务跟踪外，还在辅仁国文系安插几名日本特务，以学生身份监视其言行。任教燕京大学的郭绍虞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被日伪方面关押，目的是强迫他到伪北大任职，他断然拒绝后举家南迁。

上海沦陷后，文化人士经常遭到日军的逮捕、骚扰、诱招、迫害。日军曾派汉奸拿出巨额支票作为诱饵，收买郑振铎，邀请他主持日伪文化工作。郑振铎严词拒绝，当场将支票撕碎。避乱香港的陈寅恪也未逃脱这种骚扰与迫害。他在1942年6月19日写给傅斯年、朱家骅的信中叙述当时经历道：“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一些学者遭到骚扰，忧心国难，甚至以身殉职。据汪东《寄庵随笔》记载，“同光”诗人陈三立因病留居北平，日军进驻后，派人游说招纳，遭到陈三立的拒斥。陈氏最后发愤不食五日去世。

其二,专业研究人员经济拮据,生活困难。随着战火的蔓延,国民政府大大缩减教育经费开支,1937年9月,将已核定各国立院校的经费按七成支付。西南联大三校一年经常费用仅为7万多元一点儿。其中,教职员的薪金总额约为七成,合计不足5万元,分配到个人手中,更是微不足道。全面抗战前半年,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当时一元法币即一元银圆),至1943年下半年,西南联大教授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而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此时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如此收入,维持一家生存,苦不堪言。陈寅恪曾赋诗形容当时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严重程度:“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陈寅恪是少数教育部特聘教授之一,又兼职中央研究院,生活待遇远比一般学者优越,他的境况如此,一般教授的生活就更加苦难。一家十几口的朱自清冬天买不起棉衣,买了一袭云南赶马人穿的披毡披在身上,坚持到校上课。据中央大学周刊社《中大周刊·大学杂景》1941年6月2日报道,为了生存,教授们超负荷外出兼课,“师范学院某教授在北碚复旦大学、磁器口教育学院、柏溪分校以及校本部四处上课,实感疲于奔命”。闻一多每月薪金只够十天半月的开支,每月需要向学校透支借贷。为了糊口,家中物件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几乎全被分批寄卖。他每天上午在西南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后,半夜开始刻图章卖钱!对此状况,1944年,闻一多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兼职也并不能解决生存的问题,联大师范学院的萧涤非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任课,仍然入不敷出,只得

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他人。^①

沦陷区的情况同样艰难。北平的孙楷第因为日本人占据北平图书馆，愤然辞职，转往辅仁大学任教。北平物价高涨，孙家每常衣食不周。吴承仕转住天津，在给女儿的信中透露了艰辛的生活状况：“读书数十册，今已断粮，一时又难他适，闲至茶叶行中，与诸同乡手谈耳。”又云：“少公在此，饮食起居不过一丈之地。百物上涨一倍有余，白菜毛余一斤，十分困难，挪借度日，颇难维持。少公颇思汝。”^②

研究者整天忙于生计，留给研究的时间自然就少。此外，出于战时原因，一些研究者还将精力用之于非文学研究之其他事务上，如闻一多兼做语言训练教师，为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的译员培训班培养军事翻译人员。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朱自清就因物质条件简陋、事务纷繁而慨叹“南迁以来，皆未能集注精力于研究工作”。又道，“日日如此，如何是好！”其所担虑，正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其三，地处偏僻，研究资料奇缺。战争期间，学者们跟随学校、研究机构内迁西部，所处皆是偏僻、远离文化中心之地区，原来学校的图书、资料不能随迁。各高校因地置书，往往数量有限，国立师范学院刚开始时，只有图书千余册，其中，中文书仅七百余册。^③ 因此，缺乏必备的研究资料与图书，成为研究工作遇到的一大难题。很多研究者因为资料的缺乏，延搁或中断了计

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73～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马嘶：《1937年中国知识界》，第103、305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③ 见《国立师范学院三十年度一般概况》，《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51期，第3～17页。转引自杜元载编《革命文献（第60辑）：抗战时期之高等教育》，第357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

划中的研究项目与进程。罗根泽本拟先写作各个分册的文学批评史,然后再缩编一部简明文学批评通史。1934年8月,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周秦汉魏南北朝”部分已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之后,他完成“隋唐五代”部分。1943年,商务印书馆将这两部分分成四册出版。此书最后只写到“两宋部分”(1957年出版),罗根泽书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计划并没有完成。究其原因,有学者分析指出为资料的缺乏:

他(罗根泽)的计划也过于庞大,以一人之力也难以完成,然而妨碍他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却是混乱的时局。1937年之前,他在北京教书时,相对地说,情况还比较稳定一些,因此这一阶段的成果最为丰硕。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从民族大义出发,感到兴奋,离开了心爱的北京,撤退到了后方,先后转徙到重庆等地,都因材料不全,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抗战胜利,他随中央大学复员到南京,读书条件有好转,也就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宋部分”的初稿。^①

游国恩战前曾经制订过一个宏伟的计划,设想网罗众说,加以考核参校,作《楚辞笺证》十七卷,《考证》、《正均》、《考异》、《论文》各若干卷,《楚辞学考》、《楚辞笺注书目提要》各一卷,凡三十九卷。其中,《楚辞注疏长编》中《离骚》、《天问》的初稿完成于30年代之初。抗战八年中,由于资料缺乏,研究工作几乎无法深入。当时他全家居住在大理县喜洲镇,镇上的居民以白族为主,有关单位保存着一部分西南地区的文献资料。他只好利用现有条件,将研究的重点转到西南的地理、历史和民俗上,撰写《火把节考》、《说洱海》、《南诏用汉文字考》、《文献中所见西南民

^① 周勋初:《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见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二编》,第17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族语言资料》等有关西南地理、民俗的论文。其所专长的楚辞研究则被搁置一边,研究计划也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因为战乱的关系,学者们的藏书也未能携带随身,对学术研究造成一定影响。闻一多离家搬迁极为匆忙,只带了《三代古今文存》和《殷商书契前编》两部书,其他的书籍全都留在家中。酷爱书、藏书甚富的钱穆也只带了《通史随笔》、戴震未刊稿《孟子私淑录》和章学诚的一些未刊稿,其余藏书只好束之高阁。

其四,研究成果相对减少,不及30年代前半期。30年代前期,文学研究既全面又深入,文学史的编写异常发达。抗战爆发,这种势头戛然而止,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进入低潮。根据《上海出版志》,20年代末及整个30年代,上海出版文学史著60余种,而战争期间,仅有陈柱《中国散文史》、卢前《八股文小史》、阿英《晚清小说史》、褚民谊《中国戏剧史》、赵景深《民族文学小史》、吴烈《中国韵文演变史》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等寥寥几本,其中,陈著、卢著、阿著出现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就全国范围审视,此期文学通史只有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年)、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林庚《中国文学史》,以及朱星元的《中国文学史通论》(1939年)。^①战前一片繁盛的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专题文学史研究也呈现衰敝之态。小说史唯有郭箴一《中国小说史》(1939年),该书抄袭明显,成就不大。诗类文学史仅有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4年),该书实为萧氏就读清华研究院之毕业论文,写成于1933年。批评史似乎承袭前期余烈,有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以及朱维之《中国文艺

^① 笔者按,钱著出版于1993年,1939年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油印发行;林著出版于1944年,1941年由厦门大学油印发行,故皆列为抗战期间作品。